

內地三市五校文化素質教育考察報告

張燦輝 梁美儀 才清華*

香港中文大學

一、緣起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陸續開展一系列與通識教育相關的研究工作。研究中心的目標，並不局限於探討香港本地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同時致力於與華人地區，尤其是中國內地和台灣等地大學間的溝通與合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研究中心積極構思一系列計劃，考察、調研內地大學文化素質教育是計劃之一。

據我們理解，內地文化素質教育雖在內容與形式上同香港的通識教育存在著一定差異，但兩者所秉持之理念與目標無疑是一致的，即均以「全人發展」為核心。內地大學與香港各大學有著不同的發展軌跡，特殊的社會背景決定了兩地大學間在教育實踐方面各具特色。然而，在兩地高等教育界近年面臨的各種挑戰中，「如何培養人」始終是揮之不去的共同問題。

就國內而言，1952年內地大學仿照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強調專業培養，衍生一系列弊端，文化素質教育恰是應扭轉專業教育之

*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主任、通識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哲學系教授及系主任、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梁美儀，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副主任、通識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才清華，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弊而生。內地實踐文化素質教育逾十年，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素質教育的內容與形式近年來亦在不斷調整，尤其是「通識教育」這一名詞愈來愈為內地大學所注意和接受，可以說，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大有漸趨融合之勢。

此次訪問即基於上述背景策劃而來。2006年6月14日至22日，我們一行三人展開了對內地三市（北京、武漢、上海）五所全國重點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科技大學、復旦大學¹）文化素質教育的考察之旅。我們所關心的是，內地大學開展文化素質教育取得的進展，以及發展至今所積累的經驗對香港高等教育界之借鏡。香港各大學或許在通識教育的課程體系建設方面比內地大學先行一步，但我們也注意到近年來內地一些大學大刀闊斧的學制改革，實際上已走在香港各大學前列。目前，內地一些大學已漸將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建設提上日程。而在香港，隨著四年制大學在2012年落實，各大學亦正積極檢討現有學制問題。因此，加強兩地間之交流，互相瞭解各自積累的經驗，並就實施文化素質教育過程中各校共同關注的課題、遇到的困難以及解決難題的方法等進行充分的討論，由此避免不必要的彎路，定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

此次訪問主要以座談、參觀以及聽報告等形式進行。訪問前，我們曾通過互聯網絡或其他途徑儘可能地蒐集各校資料。百聞不如一見，通過與各校同仁們面對面暢談，我們對幾間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狀況形成了更深刻的認識，可謂收穫甚豐。

因時間所限，我們或許未能瞭解各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的全貌，故此報告基本上是從某個角度或側面出發作出總結，但我們相信，透過此報告瞭解內地不同大學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特點仍有裨益。

據我們瞭解，文化素質教育是一個由上而下推動的教育改革運

1 按訪問先後次序排列。

動，然而，不同的大學對文化素質教育的理解和具體實踐情況有很大差異。就我們此次訪問的幾所大學而論，他們對文化素質教育的理解及實踐大致可歸納為三類。第一類以開展活潑多彩的課外文化活動，亦即「第二課堂」，為推動文化素質教育的主要渠道。中國人民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在這方面成績卓著。第二類以建設文化素質教育課程為實施文化素質教育的重點，其中以清華大學核心課程和北京大學的通選課最具代表性，華中科技大學亦著手在這方面進行建設。最後，是以更為全面的學制改革去實現文化素質教育，北京大學的元培計劃和復旦大學復旦學院的成立，已引起內地對新型培養模式如火如荼的討論，此類文化素質教育實踐形式正備受關注。以下擬就我們的觀察所得，逐一介紹各校情況，並於文末總結實地考察後的一些思考。

二、中國人民大學的德育、美育實踐

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大）實踐素質教育，重點在德育和美育。這兩方面的實踐主要由人大學生工作處負責落實。6月16日，人大學生工作處處長高祥陽老師向我們介紹了人大德育、美育實踐的工作重心、系統和隊伍等情況。來自學生工作處的素質教育指導中心副主任李明奎老師、學生藝術團王建老師、學生工作處楊明剛老師、任憲偉老師，以及徐悲鴻藝術學院別敏教授、幾位藝術團的老師和同學一同參加了座談。

高祥陽老師介紹說，人大的德育、美育工作主要圍繞兩個計劃開展，兩個計劃分別是大學生素質拓展計劃和青年發展戰略計劃。大學生素質拓展計劃的工作重點在如下一些內容：

1. 思想政治與道德素養；
2. 社會實踐與志願服務；

3. 科學技術與創新創業；
4. 文體藝術與身心發展等。

青年發展戰略計劃則包括可靠接班人培養計劃等內容。

負責上述工作的隊伍有心理健康隊伍、黨團幹部隊伍、學生骨幹隊伍（如學生媒體）等。目前較有特色、已取得一定成績的亮點工程有：

1. 校園精品文化工程：如特色文化主題教育活動、學生藝術團及學生藝術類社團開展的活動；
2. 學生的自立自強工程：如由學生資助辦公室、勤工助學服務中心向同學提供各類勤工助學工作崗位；
3. 校園輿論導向工程；
4. 志願服務與實踐工程；
5. 青年戰略發展工程；
6. 心理港灣工程（青春健康之旅）；
7. 安全與國防教育工程。

高老師認為，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高校的德育工作已不能因循以往舊模式，而要注重創新。因此，相對過去的工作，學生工作處轉變德育觀念，更為注重以人為本，改變以往單向灌輸的工作方法，嘗試以更親和力、易於為學生接受的方式開展工作。

人大學生工作處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朝氣的團隊，老師與同學間亦師亦友。人大的德育、美育實踐，在許多方面甚為成功，學生藝術團已獲邀到各地多所大學演出訪問，有一定知名度。藝術團的同學多才多藝，品學兼優。

由於人大的素質教育課程主要由校教務部管理，我們此次訪問未

能拜訪其他教學部門，對人大素質教育於知識性的學術課程方面的建設所知有限。總體而言，人大將德育、美育實踐作為素質教育的重心，可視為內地大學構思素質教育的一種有代表性的模式。

三、華中科技大學的第二課堂與文化素質教育課程

華中科技大學是內地最早提倡文化素質教育的大學之一，大學的歷屆校長都相當重視文化素質教育。6月19日、20日，我們在華中科技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舉行了兩場座談會。與會的有前校長楊叔子院士，校黨委副書記、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主任歐陽康教授，基地副主任余東升教授，基地成員郭玫、張俊超老師，以及執教人文選修課的梁紅教授。

總結兩次座談會內容，我們瞭解到華中科技大學在開展第二課堂方面已取得了顯著成效，在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建設方面則仍面臨挑戰。

（一）第二課堂建設

華中科技大學第二課堂的傳統特色項目是開展多年的人文講座。講座由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組織策劃，每週都有，至今已舉辦超過一千期。在華中科技大學聽講座已漸成為校園文化標誌之一，不僅校內學生熱衷於聽講座，還吸引了其他學校學生遠道而來。華中科技大學還在人文講座的基礎上，結集出版了《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至今已出版六卷。

除舉辦人文講座外，基地還協調其他部門（如學生工作處）舉辦各類活動。另外，每年定期舉行的「中國語文水平達標測試」也已固定為所有在校生必須參加的項目。「測試」旨在強調語文運用能力的重要性，學生若未能通過考試，將不能取得畢業證書。

（二）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建設

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在推動第二課堂方面不遺餘力，文化素質教育課程規劃則由教務處主理。另外，文化素質教育基地亦透過資助少量課程（如「中華詩詞創作」、「京劇欣賞」等科目）參與課程建設。

余東升教授介紹說，目前的基本修讀要求，是理、工、醫科學生修讀10學分人文社會科學課程，文科學生修讀6學分自然科學課程。推行文化素質教育課後，課程規模擴大，門類、數量均有增加，但科目質量顯得參差，優秀的老師往往不能為文化素質教育開課。學校對人文選修課的審查也很寬鬆。因此，仍有改善空間。雖然教授文化素質教育課所計工作量比講授專業課所計工作量大，但仍需激發老師們對文化素質教育課的積極性。

歐陽康教授也表示，現在推進文化素質教育課面臨挑戰，主要體現在體制方面。因為中國大學自身歷史造成的局限，要突破原有學科建制有難度，制度上的課程變革也不易，比如政治理論課已佔一定學分，若再增加文化素質教育課學分，學生負擔會過重。因此，進一步調整存在一定限制。此外，歐陽教授還指出，目前中國大學光講文化素質教育仍不夠，還應該重視道德素質、心理素質、政治素質方面的培養，很多大學生對生命價值、自身責任沒有清晰的認識，大學應擔負培養的責任。

瞻望未來發展，余東升教授認為如能成立專家委員會，深入研討適於華中科技大學的教育課程體系，必會有助於文化素質教育課程建設。

華中科技大學在推動文化素質教育方面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值得注意的是，學校為提高教學質量，在促進師資方面亦實行了一些切實舉措。比如：學校不斷對工科老師提出加強人文素質的要求。提倡將人文精神融入專業課的講授。為此，學校明確規定老師修讀相關課程。基地與教務處、人事處也曾聯合舉辦教師讀書班，並將其納入教

師考核體系。此外，大學亦重視相關的科研專案，以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力量為依託，重視素質教育的研究。應該說，這些努力都令華中科技大學的文化素質教育走在眾多工科大学的前列。但是，我們也看到，要克服挑戰，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改革。尤其是課程建設問題，須由具學術識見與權威的部門來擔當組織和管理工作。誠如楊叔子院士所言，教育問題是歷史形成的社會問題。中國大學的文化素質教育涉及本土化、制度化問題。

四、清華大學的通識課建設

清華大學是我們此次訪問的第一站。6月14日，在清華宏盟樓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我們見到了基地顧問張豈之教授、基地主任胡顯章教授、副主任曹莉教授、程鋼教授，以及二位任教通識課的老師——歷史系彭林教授、中文系孫明君教授。座談會由胡顯章教授主持。張豈之教授首先向我們介紹了文化素質教育在中國內地大學的宏觀發展，以及國家對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視與提倡。其後曹莉教授介紹了清華大學通識課建設情況，彭林教授和孫明君教授分享了授課經驗與感受。最後，程鋼教授簡要地介紹了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第二課堂的發展。

（一）通識課建設的重點、難點以及取得的成效

據曹莉教授介紹，清華大學的通識課最初由選修課發展而來，後來在內地高校普遍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大背景下，逐漸發展為由課組課程為基本體系框架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2002年清華開始規劃文化素質教育通識課十大課組。這一規劃的另一個背景，是清華加入了教育部「985計劃」。該計劃在1998年5月值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期間提

出，目標是將納入此計劃的一批重點大學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隸屬此計劃的大學將得到國家的財政資助。現在，清華執行「985計劃」已進入第二期，由此通識課得到相應的發展和調整。從2006年秋季學期開始將實施新的本科生文化素質教育方案，新方案根據培養要求和學科專業之間的內在聯繫，將原來的十大課組重新整合成八大課組（歷史與文化；語言與文學；哲學與人生；科技與社會；當代中國與世界；法學、經濟與管理；藝術與審美；科學與技術），2006年秋季可選科目達276門，2007年春季可選科目達284門。與此同時，重點支持以人文教育為核心的「文化素質教育核心課程計劃」暨「985二期」試點工作。目前所設置的首批24門核心科目涵蓋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當代中國與世界等人文社科領域，以閱讀經典、深度學習、嚴格要求為宗旨，採取名師上課、助教導修（部分課程）的雙軌教學方式，旨在更加堅實有效地奠定本科生的人文知識和人文素質基礎，並對其他文化素質教育課程起到以綱帶目的示範作用。

在簡要介紹清華通識課的發展和結構後，曹莉教授很坦誠地談到清華建設通識課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她認為，目前清華在通識教育「要不要做」及「怎樣做」兩方面都存在問題，尤其前一個問題更加突出。大家雖然口頭上一致認同通識教育理念，卻在很多方面需要繼續努力。若同國外相比，實際上表明仍然存在著理念認同問題。老師、同學對通識課的理解存在偏差，許多人認為通識課就是擴大知識面的概論課，屬於二等課程，因此不受重視。她認為認同感的增強非一蹴而就，須假以時日，只有待大家有了切身認識與體驗後，才能形成真正的認同。

在實踐方面，曹莉教授認為，從課組的規劃與完善，到科目設計、教學水準等均有改善空間。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文科系發展後引發人力資源問題，可以說，這是像清華這樣以理工科見長的大

學所特有的問題。自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後，清華的文科系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才只有一兩個本科專業，老師們全部負責教授公共課。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文科系開始恢復本科招生，各文科系由原本專注通識課教學，變為同時負責本系專業課和通識課，本系專業課的加入無疑會削弱各系開設通識課的精力。況且，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在於，隨著本科專業的開設，各系所關注的重點很自然地由通識課轉向系專業課，因為專業課真正關乎學系的發展。事實證明，這一局面不可避免地導致各學系側重系專業課教學，比如集中系裏最好的師資於專業教學。這便間接地造成通識課水準降低。此外，個別學系對通識課採取不鼓勵態度。例如，在計算工作量時，規定上本系專業課計工作量，上學校開的通識課不計工作量。由於要兼顧教學與科研，精力有限，此類政策在老師考慮開設哪些課程時有決定性影響。目前重點扶持核心課程，旨在緩解這一問題。

就上述問題，胡顯章教授也補充說，專業主持人（系主任）對通識課的態度很關鍵，有的專業主持人重視專業教育，卻不重視學校通識教育，其所屬學系於學校通識教育的參與度必然低。可見，如何平衡專業課與通識課間的張力，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事實上，這一問題已不只是清華文科的問題，亦是其他各學系普遍面臨的問題。

除專業課與通識課間的矛盾較為突出外，曹莉教授還指出，通識課的數量及質量均未盡理想。清華每年約有三千二百名學生修讀通識課，目前只能達到每人平均選修2門核心科目的水平。由於師資有限、缺乏助教，小班教學的理想一時難以到位。

座談中，大家一致認為，要實現通識教育理想，現有條件和狀況不容樂觀。不過，經長期努力，取得的成績還是有目共睹。比如，胡顯章教授提到，清華在進行教育模式的轉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清華較為重視如何發動學生參與，打破原來的「衛生課」狀態，使學生由被

動變為學習的主體。我們由其後彭林、孫明君二位教授談開設通識課的經驗瞭解到，二位教授開設的課程恰恰都貫穿了胡教授所說的將課堂知識轉化為內在素質的理念。

（二）可汲取的授課經驗

七年前，彭林教授由北京師範大學調往清華大學，在北師大時，他從來沒聽說過文化素質課這個概念，到清華後，由於張豈之教授熱心提倡，彭教授形容當時的感覺是「耳目一新」。因當時他所在的研究所毋需開課，彭教授開始構思面向全校學生開課。當時面向全校的文化素質課側重思想史，於是他決定講先秦史。為了令枯燥內容變生動，考慮到先秦時期文物較多，遂決定從「物質文明」入手，以文物為切入點吸引學生，開設「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課。彭教授始料未及的是，這門課其後獲評為「國家級精品課」，深受學生歡迎，屢次開課，次次爆滿，人數最多時達到一學期有800人選修，甚至有學生旁聽兩遍以上。

彭教授的課之所以受歡迎，源於他曾認真地思考過科目如何構思、要體現怎樣的理念，以及從內容到形式都經過了精心設計。他總結說，自己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做課件（教學軟件）。彭教授的課以課堂講授為主，輔以課後閱讀，每學期還會安排學生到歷史博物館、河南安陽等鄰近北京的考古工地進行實地考察。在實地考察過程中，學生將課堂上講授的內容與實際結合，普遍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震撼力。

彭教授在開課過程中體會到，所開科目一定要有深層理念，但這種理念不是講出來，而是想辦法讓學生自己體會出來。比如，「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一課的理念之一是「文化自尊」。通過學習，要讓學生切身體會到並不是「西方甚麼都好，中國甚麼都不好」。從選修人數、學生在作業中表達的情感，以及之後的其他學習成果看，都表明這門課的效果不錯，說明理念滲透到學生的思想，影響了相當一部分學生。

在教學方法方面，彭教授認為，開課時要重視學科前沿，多學科

交叉，內容要新，課要生動、好聽。講課要有層次、有深度。要採取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將學生融入課堂教學的氛圍中。適當的時候可提問，學生答不出便會變得比較主動。另外，上課時老師要有情感，要重視人與人的交流。彭教授的課不僅注重課堂的互動，也重視同學的參與，比如，他給同學佈置了這樣一個題目：「介紹自己家鄉的一件文物」。這項作業鼓勵學生動手找資料，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可自由組合，交流各自的鄉土文化，這便利於學生打開思路。由於學生帶著濃厚的興趣完成作業，在製作簡報（PowerPoint）時非常花心思，於是充分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

同樣是人文通識課，孫明君教授在「中國古代詩歌欣賞」一科也下了不少功夫。這門課孫教授已開了二十多個學期。每學期講授16周，共32學時。由於時間有限，聽課對象也不同，不能再沿用開設專業課的做法。孫教授於是立足於通識科的目標，對整門課重新構思。據孫教授介紹，內容方面，這門課包括介紹中國古代詩歌的流變（線）、古代詩人處於流變中的哪一點，並將所要介紹的詩歌按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分為三大類，每類下又分小類。整門科目嘗試涉及基本知識、前沿知識、文化素質三方面問題，亦嘗試通過品詩令學生瞭解儒、道、佛三家風格，並達到審美享受。教學形式方面，重視各種類型的討論，小的討論隨時在課堂上進行，每學期組織一次大討論，佔兩學時，比如專門討論《長恨歌》。此外，網上還設有自由討論區，討論區分三個欄目：聽課有感、課外思考、個人詩詞創作，這種形式鼓勵學生於課堂外踴躍發表看法與作品。為令科目有趣、好聽，孫教授不僅製作了精美的簡報，還製作「立體詩」，即將圖片、音樂、朗誦相結合，做到繪聲繪色。科目要求方面，孫教授強調學生須在課外閱讀經典，期終要交兩篇讀書報告。

在聽過彭林教授和孫明君教授介紹經驗後，大家一致認為，要將通識課講得既生動又有內容，且兼顧深度，著實不易。然而，這恰是

通識科目努力的方向。事實上，不論內地大學，抑或香港的大學，能真正達到上述目標的通識科目並不多。一門課能否貫穿通識教育理念，對老師提出了甚高要求，包括老師要有使命感、有熱情，並投入相當的時間和精力。其次，老師還要具備深厚的修養。通識課以融會貫通為特徵，惟具有廣博的視野，才能將通識的關懷融入教學。所謂「言傳身教」，對大學生而言，老師的一言一行往往最具感染力，有時產生的影響難以估量。彭林教授曾談到，一些學生在修讀過他的科目後，確實在思想與行為上發生了諸多令人鼓舞的轉變，這些轉變對老師是激勵，也說明通識教育的目的不只在傳達知識，更在塑造人格。

（三）文化素質教育第二課堂的建設

除通識課程外，清華文化素質教育第二課堂也發展得多姿多彩。對比而言，通識課程主要由學校主導規劃；第二課堂中，學生的參與度相對較高，許多組織和活動都是學生自行發起和籌備，學校給予相應的輔助與支援。程鋼教授介紹了人文知識競賽和水木書苑的情況。人文知識競賽屬年度性活動，至今已舉辦七屆，吸引了全校各系的學生踴躍參與。水木書苑走課外社團路線，鼓勵學生閱讀經典，活動包括定期小範圍聚會研讀經典，假期由老師帶領學生與其他院校的學生一起到歷史上著名的書院交流、舉辦活動等。

定位於業餘型學習社團，第二課堂的角色是對大學教育中專業比重過高的反撥。第二課堂講求知行合一，鼓勵學生將知識內化為智慧。² 第二課堂的發展，說明學生中有一些自發的力量，有求知的渴望。只要學校給予充分支持，第二課堂將成為通識課程之外的有益補充。

在考察清華大學的文化素質教育後，我們有如下總結。

首先，回應時代需要，經歷多年發展，針對大學自身特點和遇到

2 程鋼：〈啓動古代人文傳統 開拓人文實踐教育新領域〉。

的具體問題，清華的文化素質教育在不斷進行調整，總體朝有系統、有建制的方向進步。從選修課到系統規劃後的十大課組，以及目前的核心課程，反映清華文化素質教育的目標愈來愈清晰。雖然在此過程中，問題不斷湧現，但對問題的思考與回應恰恰為改革文化素質教育指明了方向。清華建設通識課過程中浮現的問題，如理念認同、課程規劃、專業課與通識課的矛盾等，均極具代表性，是各大學發展通識教育過程中普遍面對的問題。要克服上述問題，需根據大學自身特點，不斷探索，才能找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次，清華的大部分院系屬理工商科，院系眾多，嘗試在全校範圍規劃通識課，難度極大。此階段，針對理工科學生的迫切需要，將建設通識課首先定位於以人文社會科學範疇為主的核心理課程，不失為良策。

第三，清華對通識課教師的鼓勵與支持政策值得學習。當代研究型大學以科研成果為主要考核標準，而教學與行政事務又佔據了老師們相當多的時間，能夠兼顧科研與教學殊非易事，更遑論花更多精力於教學上。在這一現實基礎上，大學必須以實際行動支持、鼓勵教學。清華的通識課獲評為國家級或北京市精品課，其中固然有老師自身的努力，某種程度上而言，學校的支持和鼓勵亦相當重要。

五、北京大學的通選課與元培計劃

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是內地大學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先導者。通選課和元培計劃可謂北大實踐文化素質教育的兩大重點。6月15日，在北大元培計劃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元培計劃管理委員會執行副主任、教務部副部長金頂兵博士介紹了北大通選課情況，元培計劃執行主任朱慶之教授向我們介紹了北大元培計劃的具體情況。此外，參加座談的還有本科教學發展戰略研究小組召集人牛大勇教授、元培

計劃管理委員會執行副主任張庭芳教授、教務部教學辦公室主任何山老師、元培計劃辦公室主任劉亞平老師，以及老教授調研組的幾位成員。

（一）通選課的發展

通選課是北大實踐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一環。北大在2000年9月正式推出通選課。通選課分五個基本領域：A. 數學與自然科學；B. 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C. 哲學與心理學；D. 歷史學；E. 語言學、文學與藝術。學校規定全校本科生均要在所屬學科外的四範疇科目中修讀16學分，且在每個領域至少選修2學分，E領域至少選修4學分，其中須有1門藝術類科目。獲得人文社會科學類學位的學生在A領域至少選修4學分。

通選課由公共選修課發展而來，目前先由院系申報，之後由專家審查通過後開設。座談中，我們瞭解到，北大對開設通選課有一定的鼓勵措施，如規定開一門通選課，補貼老師2000元人民幣用於教學活動。此外，北大也通過各種途徑調研通選課的問題，做到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研究改善策略。例如，早於1996年成立了老教授調研組，調研組成員由十幾位退休教授組成，他們分別來自文、理、社會科學等學科。調研組的主要工作是每學期設定觀察重點，組員每週聽4節課，之後作匯報、研討，研討並不限於課上問題，聽課的目的也不在於評價老師，而是觀察教學中的問題。一旦發現問題，即與學校有關部門溝通。通過這種方式，有效地解決了許多問題。

（二）元培計劃的成果與挑戰

與通選課幾乎同步進行，且密切相關的，是元培計劃。朱慶之教授向我們介紹了元培計劃的背景和醞釀過程。

元培計劃的實施背景，是近年來包括建設通選課在內的一系列教學改革。首先，北大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針對1952年全國院系

調整後過分專業化的人才培養模式，提出了「加強基礎，淡化專業，因材施教，分流培養」的十六字方針。以此方針為導向引發了一系列在課程設置、專業內部的調整改造和各院系自行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其次，元培計劃是北大本科發展戰略研究小組成立後，探索醞釀出的新型人才培養模式。其中主要的契機是1998年的「985計劃」，即國家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計劃。為配合這一計劃，北大成立了新教務部，積極構思以國外大學為藍本的教學改革，其後緊接著又於1999年成立了本科發展戰略研究小組，該小組在教務部指導下，集中了數十位北大熱衷教學改革的老師。成立本科發展戰略研究小組的目的，在於探討學校在新世紀和建設一流大學計劃中的教育教學改革的思路和方向。進入2000年後，北大本科教育隨之發生了幾方面轉變，一是以學生為中心制定政策。建立粗線條的教學管理平台，讓老師和學生有充分發展；其二，確立本科在高等教育中的基礎教育地位，實行「低年級通識教育，高年級寬口徑專業教育」。為配合新的教育理念，教學管理方面也設計了兩大變化，一為自由選課、實現真正的學分制；二為自由選擇專業。這兩個轉變成了元培計劃的兩大主要支點。

為了實施這個計劃，2001年9月元培計劃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開設元培計劃實驗班，進行新的人才培養模式實踐。

概括而言，元培計劃實驗班在學習和生活上的主要制度安排是：

1. 低年級實施通識教育。學生入學時不分專業，只按文理兩類招生。入學後，在低年級主要學習通識教育選修課和學科大類平台課。
2. 自主選擇課程和專業。學生根據自身特點和興趣，在教學計劃和導師指導下，在對自身特點、北大的學科狀況、專業設置、培養目標以及其他情況有所瞭解後，選擇進一步學習的專業領域。一般在第二學期末，由學生提出專業意向申請，第三學期末確定最終的專業方向，之後學生在有關係選課，修學各專業教學計劃規定的專業必修課和任意選修課。
3. 學分制。學生根據教學計劃和導師指導修滿規定的學分

即可畢業。實行彈性學制可在三至六年內完成學業。4. 導師制。學校從各院系聘請資深教授作導師，指導學生的選課、選專業、學習內容及方法、研究方向。5. 管理和生活制度上的設計和安排。學生在高年級進入專業後仍保持原有行政班級，統一由元培計劃管理委員會管理，不同專業的學生混合居住，為不同學科學生的相互交流和學習創造條件。³

無可否認，元培計劃是一種進步的教育模式。誠如張庭芳教授所言，元培計劃使學生通過選課來體驗日後的專業方向，計劃在尊重學生意願方面有進步。此外，元培計劃的實施還推動了全校範圍內一些相應的改革。比如：學校按照元培計劃的基本理念，通過點面結合、逐步推進的方式推動全校範圍內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材的改革，調整教學計劃；推動公共課程自由選課制；著手研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關係與銜接；研究實行學分制後如何更有效地進行學生思想政治和生活管理工作。⁴其中一項主要的變化是，受元培計劃實驗班（「小元培」）的啟發，院系從2003年開始實行「大元培」，具體做法是，全校大部分院系都實行按院系或者學科大類招生。考生按院系填報志願，按院系錄取。學生被錄取後，進入相應院系，先學習通選課及這個學科的共同基礎課，經過一年、兩年或者三年的基礎課學習後，進行分流，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自主選擇學習的專業。⁵

既屬實驗性，在執行過程中，元培計劃也難免遇到難題。可以說，元培計劃的兩大優勢均面臨衝擊。問題首先出現在與元培計劃緊

3 〈北京大學元培計劃情況介紹〉。

4 同上註。具體改革包括：1. 2002-03年全面修訂本科教學計劃，將畢業總學分數由150學分壓縮到140學分以內，將必修課學分數壓縮到總學分的60%以內，取消限制性選修課，增加學生自由選課和選擇專業的空間；增加16個通識教育通選課學分的要求，實踐通識教育理念。2. 建設320門本科生素質教育通選課，為低年級普遍實行通識教育準備師資和課程。3. 全校公共課打破過去按專業班級統一排課的固定模式，在大力改革教學內容的同時，實行新的學習制度：在保證必修課性質不變的前提下，由學生根據自己的不同情況選擇學習的時間和課堂；有關體系在教學計劃指導下，根據學生選課的情況開課。公共政治理論課、思想品德課、體育課、文科計算機課、大學英語課先後開始，逐步推行，目前全校公共必修課大部分都實現了自由選擇上課時間和課堂。4. 對本科生全面實行導師制。

5 同上註。

密配合的通選課。目前大家對通選課到底應該是甚麼樣的課，以及現有課程能否體現通選課理念等問題存在很大爭議。此外，老師的觀念、知識背景和開課態度，以及助教制度的缺失和班級規模過大都直接影響了通選課的效果。由於元培計劃的目標是實現通識教育，而通選課是實現通識教育的主要途徑，通選課對元培計劃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此外，由於制度上的限制，元培計劃的優勢之一——自由選課、學分制——未能徹底貫徹。表明現有的課程管理機制未能滿足元培班學生的實際需要。

雖然元培計劃的實施並非一帆風順。但元培計劃遇到的一些不易解決的難題並不能說明元培計劃本身是不值得提倡的，恰恰相反，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這種培養模式的優越性。歷屆收生情況也反映元培計劃甚受家長和同學認同，樹立了一定的威信。這證明元培計劃的理念是可取的，只是理念之實現，需要制度上的配合。

總體而言，北大以務實態度、循序漸進地實踐通識教育，取得了一定成效。具體表現在通選課體系已有明確規劃，並有具體舉措適時作出檢討。可以說從課程體系、建制、行政安排方面已初具一套可依循的系統。相信沿這種思路，北大通選課定會逐漸進入良性發展。我們由座談感覺到北大目前面臨的問題，主要還是集中在制度方面。換言之，通選課被引入大學教育，需要一套新制度配合。要有所改變，一要靠人的觀念改變，即是說，學校的領導層要有改變的決心與魄力，學校之下的各院系也要重視並配合；二要考慮操作上的可行性。對一個囊括眾多專業院系的綜合大學而言，有時哪怕是做出微小的改變也可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配合通識教育的改革，可能並非增加新的制度或規定那麼簡單，它還可能涉及到改變某些部門的職能，設立新的職能部門，或改變舊有的利益分配方式等等。因此，改革是在平衡各方面矛盾基礎上做出的審慎之舉，這是發展通識教育的必經階段。

六、復旦學院的新進展

6月22日，我們到訪復旦學院，瞭解學院的組織架構與運作，並與院長熊思東教授、學院黨總支書記李鈞教授、副院長高效江教授、黨總支副書記張暉老師，以及負責學院行政工作的龔萬里老師、負責學生工作的許平等老師交流，座談後我們參觀了學院下屬四個書院的學生宿舍。

熊思東教授向我們介紹了復旦學院成立近一年來的情況，並分析了目前復旦學院具備的優勢和面臨的挑戰。他說，復旦大學培養人才的主導思想是做到基礎扎實、口徑寬泛。前期的本科教育教學改革在於不斷完善學分制、自由選課制和轉專業制度等。此外，也提倡從學院層次及學系層次對每個專業的培養規格加以定位。

復旦學院的成立，標誌著復旦大學推進通識教育進入新階段。概括而言，這一新型培養模式有如下諸特點。

首先，復旦學院負責全校本科一年級和部分二年級學生⁶的教育教學管理工作。由2005年起，每屆本科生將先進入復旦學院學習生活一至二年，之後再加入所屬院系接受專業教育。又據近日有關復旦學院的報導，2006年開始，有289名通過復旦自主選拔錄取的學生將不帶專業入學，與其他已確定專業的本科生一起，在復旦學院接受一年的通識教育，一年後再確定專業方向。⁷

其次，復旦學院沒有自己的教師，但有科目設置權。目前的新體

6 臨床醫學系八年制的本科生需在復旦學院學習生活兩年，比其他專業本科生多修讀一年通識教育課程。

7 「自主選拔錄取」指學生不通過全國高等學校統一考試（高考），而是各大學根據各自的特點設計選拔程式，錄取學生。目前「自主選拔錄取」試點僅在為數不多的全國重點大學（如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實行，有資格報考的學生也有地區限制，並未推廣至全國所有大學和所有考生。此外，2006年復旦大學招收的新生分三大類，第一類按專業錄取；第二類按大類錄取，如文史類、經管類等；第三類即自主招生錄取的學生，既不按專業，也不按大類。

制下，本科課程劃分為三部分，一為綜合教育課程，包括政治課、英文、體育、軍事等科目，以及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核心課程的規劃，力求體現復旦價值，為學生提供能夠幫助其形成基本的人文修養、思想視野和精神感悟的科目。核心課程分六大模塊，包括文史經典與文化傳承、哲學智慧與批判性思維、文明對話與世界視野、科技進步與科學精神、生態環境與生命關懷、藝術創作與審美體驗。2006級本科生將成為第一屆選修核心課程的學生；二為文理基礎課程，設置人文、法政、經管、數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醫學七組基礎科目；三為專業教育課程。

在上述三部分課程中，與復旦學院直接相關的是通識教育核心課程，核心課程的規劃由復旦學院主導，並與學校教務處協調制定，但具體科目由各院系提供。為規劃合理的課程體系，還設有專業小組，負責設計和評估六大模塊課程。此外，在計算工作量方面，規定教授通識課所計工作量比開設院系科目所計工作量要大。

第三，在學生生活方面，學院借鑒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住宿學院」的做法，承續中國書院文化傳統，建成以復旦歷史上德高望重的老校長名字命名的志德、騰飛、克卿、任重四個書院。2005年，三千七百多名不同專業、不同學科、不同地域的新生一入學就被最大限度地混合重組，編成42個班級，入住四大書院，每個書院都擁有各自的院徽、院訓、院服、活動場地。各書院積極組織課外的通識綜合教育系列計劃，包括「大學導航」、「學養拓展」、「公民教養」和「知識補習」計劃。

最後，為長期支援通識教育的發展，復旦大學還於2005年11月成立了通識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彙聚了復旦學院、教務部、復旦高等教育研究所等各方面力量，旨在對本科通識教育改革實踐進行戰略性研究，並加以決策諮詢。

七、元培計劃與復旦學院的比較

成立復旦學院，在中國高等教育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可以說，此次復旦改革幅度之大，是多年來內地高等教育界所未有。尤其是在內地眾多大學剛剛開始接觸通識教育，對通識教育模式仍感陌生的時候，復旦大學率先實行本科一年級以通識教育為主，這一改革引起社會多方面關注是可想而知的。考生與家長們關注這一新的教育模式能否充分發掘學生潛力，培養出健全、適應性強的人才；內地其他兄弟院校亦關心復旦學院今後的發展，並對照自身情況研討是否要朝復旦學院的方向改革。總體而言，各方對復旦學院的新型教育模式持肯定態度。與此同時，亦有學者表示好奇、疑慮。瞭解內地大學體制的學者很自然地會將復旦學院與北大元培計劃加以對比。對比之下，提出如下問題：復旦學院與元培計劃都是努力實踐通識教育的新模式，元培計劃至今已實施五年，但一直屬小範圍實驗性質，為何已實施多年的元培計劃仍未能得到推廣？北大校方對此計劃究竟有哪些方面的保留？從所涉範圍而言，復旦大學的改革顯然比元培計劃更進一步，按這一趨勢，通識教育將逐漸擴展到歷屆學生。那麼，復旦大學又是在具備了哪些條件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的呢？僅就我們此次訪問的見聞恐怕難以對這些問題給予完滿解答，但仍願就已掌握的情況發表些粗淺之見。

復旦學院與元培計劃分享了許多共同點，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們都以通識教育為核心理念。其次，二者均以建設學分制和完善通識課程體系為實現通識教育的重點舉措。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復旦學院的大部分學生在入學前已經確定了專業方向，元培班的學生入學時未有專業方向，在修讀一至兩年課程後自主選擇專業方向；復旦學院的學生在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基本由學院管理，二至四年級回歸所屬院系，元培班學生的學籍始終由元培計劃辦公室管理，學生在四年中與院系的接觸相對較少。

此外，復旦大學與北京大學在實踐通識教育過程中的策略亦略有不同。復旦未經過小範圍實驗階段，直接將通識教育推廣至全部學生。北京大學則以元培計劃和全校性的通選課並行發展為特色。在元培計劃積累了一定經驗後，院系開始嘗試推行「大元培」計劃，即按院系招生，低年級按學部大類培養。從培養模式來看，雖然院系的「大元培」仍屬於舊體制之內，但院系的「大元培」是在對學校的「小元培」（即元培計劃實驗班）有所借鑒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說明元培計劃對引發全校性的教育改革有重要意義。

對比過程中，我們發現兩所大學有各自的考慮。在舊有行政體制、院系系統基礎上，很難將本科生培養徹底轉變為國外的文理學院模式，復旦學院的策略或許正是出於此種考慮，學生有二至三年的時間在各自院系受教育，這一限度不會影響學生的專業教育，應在院系的容忍範圍之內。元培計劃屬實驗性質，由元培計劃辦公室全權負責管理工作，院系僅是科目的提供者，因此，學生與各院系的關係略顯疏離。這一形式與傳統方式差距較大，易造成院系不重視元培計劃。因為元培班學生不屬院系管理範圍，難以說服院系為照顧這些學生的需要制定配套措施。可見，雖然從所涉範圍看，復旦學院的規模大、改革的聲勢大，元培計劃的規模較小，但從二者對配套制度的要求而言，實現元培計劃實際要比復旦學院需具備更多條件。或許正因此，北大堅持採取漸進式的教學改革，在小範圍實踐元培計劃。

無論復旦學院，抑或元培計劃，都面臨如何處理與院系間的關係問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經驗不約而同地顯示，在發展通識教育與院系發展專業教育之間存在著緊張。說服院系積極開設高質量的通識教育科目有難度。其次，增加學生修讀通識科目的學分，勢必會減少專業教育比重，又或者改變院系對學生的管理權，這樣的改革都不易為院系接受。成立復旦學院並非表明復旦大學已成功地解決了上述問題，復旦校方毫不諱言調和復旦學院與院系的關係是大問題。據我們

觀察，復旦能勇敢地跨出第一步，與復旦校級領導的堅定支持關係密切。由校方主導的改革有助於局面的展開，接下來復旦學院將面臨更為具體的操作性議題，如各部門間的協調、課程的規劃、實行助教制等。相信要逐步完善各項措施，健全體制，並從觀念上有所扭轉，形成重視通識教育的文化，均尚需時日。

在上海的幾日，我們曾遇到一位復旦學院學生，當時我們問她，「復旦學院與以往的培養方式最大的分別在哪裏？」她回答說，感受最深的是書院制為來自不同院系的同學提供了共同交流的空間。通過瞭解各自領域，學會多角度看問題，瞭解其他同學的專業後，也激發她產生了多方面興趣。另外，由於從學時和內容上壓縮了原有的政治課，使得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各領域知識。雖然她還未必能理解這種安排的用意所在，但顯然她對復旦學院的培養模式非常擁護，這說明復旦學院的發展趨勢是符合學生發展需要的。

八、訪問的印證

教育部提倡文化素質教育已逾十年，十年來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受重視。教育部不斷發佈相關的指導、規劃性政策，也不斷適時檢討過往經驗。2006年6月16日，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會在清華大學舉行會議，總結出當前文化素質教育存在的三大問題：第一，對文化素質教育的誤解。文件指出文化素質教育既是一種教育思想，也是一種教育模式。有學校領導以為文化素質教育就是開展校園文化活動，是嚴重誤解。第二，深層次的理論問題還有待深入研究。這些問題包括：文化素質教育與通識教育的關係，文化素質教育與思想品德教育的關係，以及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係等。第三，進一步加強文化素質教育的制度建設。包括儘快起草並頒佈新批基地的建設

條例，加強對首批基地的督導和評估，加強與推進文化素質教育的課程和教材建設等。⁸可以說，這些結論與我們觀察所得極相吻合。

我們看到，很大程度上，各高校所選擇的文化素質教育模式因應他們各自對文化素質教育理解的不同而存在差異。有的重視課程體系的規劃，有的重視第二課堂的建設，有的將兩者結合，還有新教育模式的實踐。基本上他們是從各自對政策的理解、辦學理念、實際條件和需要出發，設置學制和課程。雖然前期探索過程中確實產生了一些問題，但其實這些問題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目前中國高校教育存在的問題。可以說，前期探索為尋找文化素質教育發展改革提供了可借鑒經驗。

在教育部大力倡導下，文化素質教育已成為高校教育改革的一個方向，各高校都確實有一些老師在很認真地探索和實踐。綜合各大學實施文化素質教育的現況，可見文化素質教育受學生擁護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在理念、機制和課程內容設置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

理念方面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一為對理念的理解、認識不足。許多老師及同學對文化素質教育課的理解，還停留在概論課、擴大知識面的課、二等課、營養課階段。由於沒有清晰的文化素質教育理念，所以部分課程體系顯得較為混亂。即使課程體系有規劃，也是簡單地將以往的選修課抽出一部分，歸為文化素質教育課，而未能深入研究素質教育理念為何，以及如何建設課程才能充分反映文化素質教育的理念。其次，理念認同仍是大問題。文化素質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往往被忽視，造成實踐時阻力大、問題多。阻力可能來自多方面，如學校領導層不重視，未能給予有力支持；又如院系的對抗；文化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的矛盾極為突出等等。

8 〈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2006年主任委員會議紀要〉，《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通訊》，2006年第2期。

除理念方面的問題外，缺乏制度保障是內地推行文化素質教育的嚴重問題。推行文化素質教育亟需一套合理可行的制度，包括成立統籌文化素質教育的專責部門並明確其他相關部門的職責。目前國內大學的情況不一，課程規劃和管理，有的由教務部負責，有的由文化素質教育基地負責。單純由教務部負責課程規劃存在一定的問題，因為教務部屬行政部門，而規劃合理的課程體系需要有學術背景為依託。在此情況下，成立負責檢討課程體系和課程質量的委員會，實屬必需。另外，由於內地大學部門眾多，實施文化素質教育牽涉廣，必須有合作精神才能成功。實際上，一個完善的制度牽涉甚廣。比如，要求校方保證充足穩定的資源投入，在老師、同學間加強文化素質教育的認識與宣傳，激勵教師投入文化素質教育教學、提升文化素質教育課質量等等。因此，制度的建構還需長期積累和鞏固。

最後，各大學依從各自情況和特徵開展文化素質教育既有優點，又存在弊端。弊端主要表現在各校從理念到具體措施都各自為政，院校間缺乏足夠的交流與借鏡，未能形成從理論到實踐的良好討論氛圍。因此，內地大學若能形成一定的機制來定期進行整合分析，有意識地建立長期合作交流關係，便能加速經驗的積累和推進文化素質教育建設的成效。

我們回到香港中文大學後，曾在通識教育研究中心舉辦的「通識午餐聚會」上向校內通識科老師和參與大學通識教育管理的同事報告此次訪問情況。同事們很高興能有機會瞭解到內地大學的最新發展，大家一致肯定內地大學所取得的成績，對照自檢，認為內地大學的一些經驗值得借鏡。我們相信，這樣的交流無論對香港中文大學，抑或對內地大學而言，都是極為有益的。

參考書目

1. 〈北京大學元培計劃情況介紹〉。
2. 〈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2006年主任委員會議紀要〉，《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通訊》，2006年第2期。
3. 程鋼，〈啟動古代人文傳統 開拓人文實踐教育新領域〉。

